

【名家阅读】

# 为什么要读梁启超

□顾则徐

真上则大有问题,颠来倒去编印贪利的新书弄不清到底有多少,虽然有一两本颇可读,但信了他,有他名字的书拿来读,大可能倒胃口。信了余世存就稳妥,凡有他名字的书拿来读不会冤枉,同样姓余,写书、出书的态度大不同。信了一个作者,便可以从他的书里生发开去,假如读余世存,余世存在书里说余秋雨有本叫《文化苦旅》的书还不错,再去买来读,一定不会上当。按这方法读当代书,最是件合算的事。

有位书画理论家曾问我:近现代乃至古代的中国书,最好从哪里开始入手读?我答:最好是从梁启超读起。

所谓读书之入手,也就是读书之切入,从一个点切入,这个切入有利于通达到其他,便捷于从读此书到读彼书,就是一个好点。这个切入点可以是一本书,也可以是一个人。纵观三千年,试图找出一本十分恰当的书来切入十分之难,毋若找出一个人来,这个人莫

若梁启超最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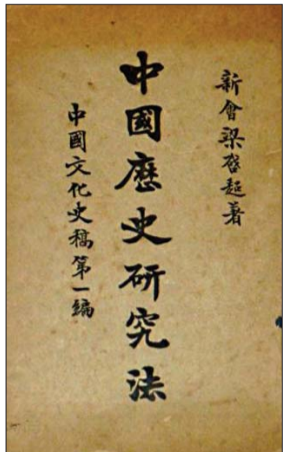
自古以至近现代,以一人言论而独领一时代者,唯有梁启超一人而已。1943年时梁漱溟说:“就在近五十年之始,便是他工作开始之时。在距今四十年前,在思想界已造成了整个是他的天下。在距今三十五年前后的中国政治,全为立宪运动所支配,而这一运动即以他为主……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康氏原为任公之师,任公原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但是不数年间,任公的声光远出康氏之上,而掩盖了他。”(梁漱溟《纪念梁任公先生》)大致来说,梁漱溟这说法是客观的,只是重于梁启超政治影响力则有偏颇。

就政治影响力而言,自戊戌变法至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梁启超作为中国最重要政治家的影响力前后占据二十年左右。梁启超曾设想用一百个人的传记“包

括中国全部文化的历史”,而政治家一类在清末民初他以为应是曾国藩、胡林翼合传,李鸿章、孙文、蔡锷分别专传,又遗憾地认为“蔡锷做时代中心的时间太短,不十分够”。(参见梁启超《中国文化史·专传的做法》)其实,从清末到民初的转型期间,他自己才是比蔡锷更有资格跟孙文一起做专传的人物。但梁启超的意义又并非局限于政治层面,在思想、学术的层面也许更为重要,是孙文所远不能比拟的,加以梁启超又是伟大的文章家,所以,他是一个时代最完整的浓缩和最完美的载体。

用现在世俗的话语来说,梁启超是一个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学术家、大文章家兼于一身的人物,可谓古今一人而已。读书如果要选择一人入手,所能获取的营养,还能有谁著述能比梁启超的更良好呢?

(本文作者为学者,著有《梁启超哲言录》)



【闲读随笔】

## 郭沫若笔下的夏天

□史曙辉



四季中最有人气的当数春秋了。春获金牌,人们说“红杏枝头春意闹”;秋虽获银牌,但领袖赋道“不似春光,胜似春光”,还有寓意深深的戏名“唐伯虎点秋香”。

夏呢,虽人在中年,已有些适应、有些向往了,但仍乃叶公好龙,夏至深处,便觉得不胜沉重。

小时,奶奶常说:“辉子苦夏”,小脸儿黄黄的,总不爱吃饭。

今夏,仍是难耐,且又多了一样不便。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是我学习英语的主要依靠,2007年买的,至今已七年了,虽不敢比拟孔夫子的“韦编三绝”,但天天翻看,右下角已是黑乎乎的一片手油灰了。到了高温溽热之日,油灰“发酵”,词典页就在下方粘住,只好用手指小心地劈开,真让人烦。书店还摆着一本同样的《英汉大词典》,但与我手中的是同版,我不想换,我想等个新版本。

虽仍有些厌夏,但已影影绰绰地明白:有人对夏的承受力和感受与我是大相径庭的。

那是五年前的一个夏日,与老家的一位儿时玩伴闲聊。其间,我大发感慨:“夏天还不如冬天。”他却笑着反驳:“不!夏天热点不算个啥,寒冬却让人承受不住。”

我心中蓦地涌出个小意

识:莫非他喜欢夏天,与我不一样?

但本人拙于读心读脑,没有进一步地探索,仍夜郎自大式地主观臆断:所有人都不喜欢夏天,起码从心上。

但读书却让我否定了我的成见,证实了那个小推测:有人喜欢夏天,而且从心里。从图书馆借了一本内蒙古文化出版社的《郭沫若散文》,读了《丁东草(三章)》,其中有“石榴”一章,郭老写道:“我本来就喜欢夏天。夏天是整个宇宙向上的一个阶段,在这时使人的身心解脱尽重重的束缚。”与我的感觉不一样。但郭老与鲁迅先生一样,是一代文宗,我想他的感情也是有代表性的:有许多人喜欢夏天,从心里。

所以此刻我想,以后要少一些咒骂夏天,因为这会触碰一些人的感情。

而且郭老在文中还把榴花比作“夏天的心脏”。确实,温柔中蕴热烈,热烈里藏温柔,榴花就是夏之心脏。

在这本散文集里,郭老还以三篇写鸡的文章《菩提树下》、《鸡雏》、《鸡之归去来》颠覆了我的鸡观点。三文写他在日本游学期间与“想给孩子们多吃几个鸡蛋”的妻子安娜的苦中有甜的养鸡故事,堪称鸡文经典,读后让我对鸡有了进一步的亲近。

郭老还写了一篇《小麻猫》,描述“素来是不大喜欢猫的”他为了对付“重庆这座山城老鼠多而且大”的状况,买了一只“小麻猫”,经过曲折旖旎的情节,最后“我实在感触着了自然的最美的一面,我实在消除了我几十年来来的厌猫的心理”。

扯得再远一点,我还在散文《丁东草(三章)》之“丁东”一章了解到,郭老的听觉在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时期“早就聋了”,“无昼无夜地我只听见苍蝇在我耳畔嗡嗡”。对,我想起来了,郭老老老时代的照片就戴着助听器。

这再一次证明:有残疾的人同样可以取得卓越的成就。

【大家著作】

## 《人权论集》背后的故事

□邵建

《新月》这份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文学杂志突然不甘文学,出现了与文学本不相干的文字,它就是胡适的《人权与约法》。随着这篇文章的出现,该杂志迅速政论化,尽管没有完全离开文学,但却不可自抑地走上了政治批判的道路。

“人权论战”发生在上海的《新月》杂志上,是由胡适挑头、罗隆基和梁实秋紧跟而上的。《新月》杂志创刊于1928年3月10日,由新月书店出版。这个杂志的主要成员除人权论战中的三剑客胡、罗、梁外,还有徐志摩、潘光旦、叶公超、余上沅、饶孟侃、邵洵美等,这些都是地地道道的文人,就像杂志是一份地地道道的文艺性和文化性杂志一样。然而时间不过一年,这份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文学杂志突然不甘文学,出现了与文学本不相干的文字,它就是胡适的《人权与约法》。随着这篇文章的出现,该杂志迅速政论化,尽管没有完全离开文学,但却不可自抑地走上了政治批判的道路。这甚至连它的主办者当时都意想不到。那么,是一种什么力量推动着这份杂志、推动着这个杂志中的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在他们所钟爱的文学和文化之外,惹来这本和自己并不相干的政论风潮呢?

胡适的《人权与约法》发表在《新月》杂志第二卷第二号上,写作时间是1929年5月6日。这篇文章从否定的方面来说,是批判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从肯定的方面来说,是呼吁国民党立法以保障人权。法与法治,是胡适留美的习得,也是他据以抗争国民党的出发点。这一点对于胡适来说是一贯的。

但,国民党建政一段时间以后,体制未见法治动

作,却出现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陈德征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个议案《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提案者认为:“查过去处置反革命分子之办法,辄以移解法院为唯一归宿,而普通法院因碍于法例之拘束,常忽于反革命分子之实际行动,而以事后证据不足为辞,宽纵著名之反革命分子。”因此,提案者提议:“凡经省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如不服得上诉,唯上级法院或其他上级法定之受理机关,如得中央党部之书面证明,即当驳斥之。”根据陈德征的提案,法院成了国民党的一个机构。

该提案发表在1929年3月26日的上海各报上,胡适看到这则提案的当天,便忍不住提笔写信给当时的司法院长王宠惠,说:“先生是研究法律的专门学者,对于此种提案,不知作何感想?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哪一世纪哪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近日读各报的专电,真有闻所未闻之感,中国国民党有这样党员,创此新制,大足以夸耀全世界了。”信完后,胡适一边寄王宠惠,一边又把信稿给国闻通讯社发表,过了几天,国闻通讯社回信,说:稿子已转送各报,未见刊出,闻已被检查者扣去。兹将原稿奉还。在胡适看来,这封

信并没有什么军事机密,自己又是亲自署名,是以负责的态度讨论国家问题,为什么不可以呢?何况公开发表意见属于言论自由,新闻监察人的无理干涉,那么,言论自由的权利又如何保障呢?

其间,胡适与朋友马君武有过一次谈话。据胡适日记(1929年4月26日)记载:“马君武先生谈政治,以为此时应有一个大运动起来,明白否认一个党专政,取消现有的党的组织,以宪法为号召,恢复民国初年的局面。这话很有理,将来必有出此一途者。君武又说,当日有国会时,我们只见其恶,现在回想起来,无论国会怎样腐败,总比没有国会好。究竟解决于国会会场,总比解决于战场好的多多。我为他进一解:当日袁世凯能出钱买议员,便是怕议会的一票;曹锟肯出钱买一票,也只是看重那一票。他们至少还承认那一票所代表的权力。这便是民治的起点。现在的政治才是无法无天的政治了。”

胡适颇认同马君武的看法:“此时应有一个大运动起来”,于是,一场被后来历史称为“人权论战”的运动就不期而至了。当然人权论战不是一个大运动,甚至连运动都算不上,它乃是轰动一时的一场政治风波。为这场风波揭幕的就是胡适的《人权与约法》。

(本文作者为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教授)